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

中国 古代杂技发展概略

聂传学著 林冠夫审定

新

出版社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

中国古代杂技发展概略

聂传学 著

林冠夫 审定

新华出版社

京新登字 110 号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

中国古代杂技发展概略

聂传学著 林冠夫审定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 销

北京京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125 印张 插页 2 张 102,000 字

1992 年 12 月第一版 1992 年 12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ISBN 7—5011—1579—6/G · 563 定价：3.00 元

序

季羨林

最近几年来，有关方面的人士提出了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口号，立即得到了全体中国人民，甚至海外华人和华裔的同声赞扬和热诚响应，足证这个口号提到了人们的心坎上，是完全正确而且及时的。

根据过去的经验，所有正确的口号都必须落实到行动上，才算有效。因此，我们中国文化书院的同仁们和东方影视集团总经理李生泉同志等，爱国不敢后人，也想尽上自己的绵薄，为这宏伟的盛举增砖添瓦，几经酝酿磋商，发起了这项《神州文化集成》大型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这中间也得到了新华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计划先出一百本，并将配以电视录像。读者与观者，不限于大陆上的同胞，也包括大陆以外的华人和华裔；台湾在内，自不在话下；我们甚至想象，连在历史上同中国文化交流密切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

也都包括在里面。至于这个范围以外的世界上所有想了解中国文化的国家，如果对我们的丛书和影视也感兴趣，我们当然也衷心欢迎。“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这就是我们的期望。

抱着这种想法和期望，我们开始了组稿活动。在较短的期间内，我们约请了一些国内学有专长的老中青年的学者，承担各书撰写的任务。尽管有不少学者工作十分繁忙，但是一听到我们发起的宗旨，无不慨然应允。为了保证著作质量，我们规定了严格的审稿制度。谁也没有“特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弘扬我们先民留下来的优秀文化。这一点，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告诉我们的读者和观众。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最初我们想定名为《神州文化精华》或者《精粹》。但是有的同志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上来看，我们中华文化，不管有多么光辉灿烂，不管对全人类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它同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的文化一样，并不可能完全都是精华。我们的丛书中也介绍了一些非介绍不行的反映中国特殊文化的现象，它也许谈不上什么精华，但也绝非“毒品”，它似乎是中性的，绝对无害，也许还有益处，它能增强国外读者和观者对中国的全面了解。基于以上的考虑，我们把本丛书命名为《集成》。

我们的丛书虽然冠以“神州”，但是我们考虑问题的视野却绝不限于神州。

最近几年来，我经常考虑一些有关文化的问题。如果说我的考虑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我并不圈

于神州这一个地区，也不限于当前这一个时代。我收藏着一方清代浙派大家陈曼生刻的图章，其文曰“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这完全符合我的精神。我于文化问题绝非内行里手，我也不装出这番模样。但是，我看到了一些东西，想到了一些东西，我不愿意妄自菲薄，也不愿意敝帚自珍，于是就写了一些短文，在不同的座谈会上也做了几次发言。得到的反应多是肯定的。连一些外国学者也不例外。这当然增强了我进一步探讨的信心。

我觉得，我们过去谈论中国文化，往往就事论事，只就中国论中国，只就眼前论中国。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像瞎子摸象一样，摸不到全貌，摸不到真相。经过我多年的思考，我认为，从人类整个历史来看，全世界人民共创造出来了四个大的文化体系。所谓“大”指的是历史悠久、影响广被、至今仍然存在的文化体系。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发现了只有四个：中国、印度、伊斯兰和欧美。其中前三个属于东方文化范畴，第四个属于西方。东西两大体系，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相异者更为突出。据我个人的看法，关键在于思维方式：东方综合，西方分析。所谓“分析”，比较科学一点的说法是把事物的整体分解为许多部分，越分越细。这有其优点：比较深入地观察了事物的本质。但也有其缺点：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谓“综合”就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成一气，使之变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普遍联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

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

我浅见所及，东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即在于此。

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想了解中国文化，必先了解东方文化；而要想了解东方文化，必先了解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了解必须同时并进，相互对照，相互比较，初时较粗，后来渐细，螺旋上升，终至豁然。

我想先从医药中举一个例子。人们都知道，西医和中医是完全不同的，两者的历史背景完全不同，发展过程也完全不同，因此，诊断、处方、药材等等都不一样。最明显的差别是大家所熟知的：西医常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则往往是头痛医脚，比如针灸的穴位就是如此。提高到思维方式来看，中医比西医更注重普遍联系，注意整体观念。

再拿语言文字来作一个例子。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特别是那一些最古老的如吠陀语和梵文等等，形态变化异常复杂，只看一个词儿，就能判定它的含义。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只看单独一个词儿，你就不敢判定它的含义，必须把它放在一个词组中或句子中，它的含义才能判定。使用惯了这种语言的中国人，特别是汉族，在潜意识里就习惯于普遍联系，习惯于整体观念。

再如绘画，中西也是不相同的。许多学者，比如申小龙先生等，认为西画是“焦点透视”，中国画是“散点透视”。你看一幅中国山水画，可以步步走，面面观，“景内走动”，没有一个固定的焦点。申小龙还

引用了李约瑟和普利高津的意见，认为汉民族有有机整体思维方式。

从上面几个简单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特点。约而言之，这个特点可以归纳为普遍联系和整体观念。从“科学主义”的观点上来看，这未免有点模糊，但是这个“模糊”却绝非通常所谓的“不清不楚”，而是有比较严格的科学含义，它强调的正是普遍联系。这同我上面讲的东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是“综合”，是完全一致的。

我的这一点想法，颇得到一些学人的赞同。在北京召开的“东方文化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讲了我的看法。会议结束以后，一位日本大学教授专程来到我家，向我表示他很赞成我的意见。我最近到南朝鲜访问，在社会科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我又谈了我的看法，一位大概是主张“全盘西化”的教授说：“我们韩国没有东方文化！”我在大吃一惊之余，举了几个我在汉城几所大学中看到的例子，说明那里是有东方文化的。那位教授最后还是承认了我的看法。

但是，不管有多少人赞成我的想法，我毕竟不精于此道。亿而偶中，是可能的；亿而不中，又何尝不可能呢？我这一点粗略的想法，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无法用实践来证明。即使在非常长的时间内，也只能逐渐地通过世界文化的发展来验证。这一点我想是大家都同意的。

一个人自己有了一点新的看法，而且又觉得它是可能站得住脚的，总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理解。得到赞

成，当然高兴；得到否定，也可以起他山之石的作用。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像一个传教士一样，一有机会，就宣传我的“上帝”。现在就是借写这篇序的机会，再絮叨一遍。

我这一篇所谓总序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我绝无意强加于人。强加于人的作法是愚蠢的。百家争鸣，我只是一家。但有一点我是十分坚定的，看中国文化，必须把它放在东方文化这个大框架内，放在世界文化这个更大的框架内，才能看得清楚。如果在时间和空间方面不能放开眼光，囿于积习，墨守成规，则对我们祖国的优秀文化，无论如何也是认识不清楚的。弘扬中华文化，发扬爱国主义，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神圣的责任。我们这套丛书的每一位作者和电视录像的制作者，都会认真负责地从事自己的工作。我希望，我们的任务能够完成；我希望，我们的目的能够达到。是为序。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目 录

序	季羡林
第一章 杂技起源	1
一、渔猎与技巧	1
二、农牧与驯兽	4
三、执干戚舞	7
四、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杂技表演的原始形态	9
第二章 先秦乐舞	13
一、奇伟之戏与周代乐舞	13
二、新乐兴，杂技起	17
三、随征战而兴起的娱乐	21
四、先秦杂技总汇——角抵戏	25
第三章 汉代百戏	29
一、杂技复兴的倡导者汉武帝	29
二、汉代杂技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33
三、宴乐杂技	37
四、风行的新技艺	40
五、广场百戏	45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隋:交流与融汇	51
一、三曹与杂技	51
二、交流与融汇	55
三、佛陀盛会、百戏腾骧	60
四、宫廷百戏	63
第五章 盛唐风韵	69
一、杂技的正式管理机构——教坊	69
二、唐玄宗的爱好与开元、天宝时尚	74
三、“胡技”与“胡舞”	80
四、江山破碎、技艺衰微	85
第六章 两宋习俗与杂技	91
一、左右军及诸般供奉	91
二、清明——百戏纷呈的节日	96
三、国技“蹴鞠”	101
四、瓦子伎艺	106
五、民间社火	111
第七章 辽·金·元杂技	115
第八章 明清流变	119
一、最后的宫廷表演	119
二、流落江湖、跑马卖解	123
三、上堂会与戏中技	129
四、走会艺术	134
五、农民起义中的杂技英烈	138
第九章 近代中国的杂技	143
一、西洋马戏进入中国	143

二、中国杂技走出国门	147
三、萌芽初现	150
后记	李生泉 153

第一章 杂技起源

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杂技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古老的艺术活动，它的起源，无疑也与我们祖先的生产实践密切相关。

一、渔猎与技巧

人类自古猿进化，成为“直立人”，首先创造的便是石制的工具。旧石器时期，人类采用敲击的方法，获得了石球、石片、石斧、石制尖状器。依赖这些最原始的工具，他们与大自然斗争，逐步获取了生存的权利。

那时候，“人民少而禽兽众”（《韩非子·五蠹》）。据生物学家们考证，仅在“北京人”生活的周口店一带，就有剑齿虎、犀牛、鬣狗等十几种猛兽。我们的祖先，时时处在“鸷鸟攫老弱，猛兽食颤民”的凶险环境之中。

《尸子·君治》中，描绘了上古时代初民们的生活，“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渔；宓羲之世，天下多兽，姑

其是猎。

我国的甲骨文字中，曾有过这样的记载：“甲申王其~~伐~~虎”（《铁云藏龟拾遗》），“今夕其雨，获象”（《殷虚书契前编》）。一般认为，甲骨文字多出于商代，其记载表述的是较远古稍近些的现实。虽如此，它仍可以给今天的人们提供一个古人类战胜猛兽的明晰轮廓。

那时候，无论获虎还是伏象，无论采用“灵鼓而殴之”的群体围捕的办法，还是采用身披兽皮、仿效兽声、利用陷阱的诱杀方式，最终解决野兽的关键，还在于人与兽之间的肉搏。严酷的环境，迫使人类不断地增进自身的智慧与力量，掌握迅速克敌制胜的技巧。

在“蓝田人”的原始遗迹中，发现过敲制的石球。这种石球在三门峡、丁村等遗址中也均有发现。发现数量最多的是山西、河北两省交界处的许家窑。那里发掘的原始石球竟有两千多个，而且是成堆堆放的。大的直径十厘米左右，小的宛如一个小苹果。与石球一起，发现了大批古人类吃剩下的动物骨骼，显然，这些石球就是打猎的工具。古人类在追击野兽时，为了延长手臂的功能，便用藤索套上石球，将他们飞抛出去，或击中野兽，或缠住野兽的四肢。谁具有高超的投掷技巧，谁就可以多获得猎物。

达尔文在美洲考察时，曾亲眼看到当地的土著印第安人用投石索捕捉鸵鸟与野兽。投石索上系着两个或三个石球，使用时，手中握着最小的一个，用力盘旋，然后对准目标飞掷出去。石球击中目标，其余的石球带动索绳盘绕过来，再凶猛的野兽也难逃被捆缚的厄运。

的杂技艺人们手中的“剑器”、“水流星”、“火流星”，就是由此演化而来的。飞去来器也与此类似，它本是古人类打猎的工具；飞掷不中，仍可飞回到掷者手中。今天，它也演化成为杂技道具。与原始狩猎有关，后来成为杂技艺术的品种，还有许多。譬如“飞叉”、“飞刀”、“投枪”、“鞭技”等等。此外，伴随当时“构木为巢、为避群害”（《韩非子·五蠹》）的居处方式而出现的爬上爬下的活动，也成为“缘橦”，亦即“竿技”的先端。

常言说道：“熟能生巧”。这些普通的生产动作之所以能够从原始狩猎中脱胎出来，不断演化升华而具有了表演形态，无疑是与我们祖先能够十分熟练地掌握、运用手中那些最原始的工具分不开的。

说到熟练地使用原始工具，并由此产生技巧，这里必须提及与弓箭有关的“射技”。恩格斯曾经说过：“弓箭对于蒙昧的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大约在二万八千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利用尖石作为箭矢。山西省朔县峙峪遗址中的出土实物，即是证明。

《古诗源》中有这样一则故事：

吴越春秋之际，越王勾践欲伐吴，大夫范蠡举荐善射者陈音。勾践问陈音“射”是怎样产生的。陈音答道：“臣闻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起于古之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陈音还吟道：“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这就是传于后世的《弹歌》。

陈音所述，很符合旧石器时期人类出于求生的本能而发

明弹弓和弓箭的创造过程。这一过程，既是当时社会生产活动的标志，同时也衍生出历时万载而不衰的“射”的技巧。

射技对于后世的某些杂技艺术种类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孟子》中说：“羿之教之射，必志于彀，学者亦必志于彀。”意思是说，对于射技，无论教的还是学的，首先都得把弓拉满，要沉稳有力。

《庄子》中阐述的又是一番境界：“引之满盈，措杯水其肘上，发之，镝矢复沓，方矢复寓。当是时也，犹象人也”。其大意是说，把弓拉满时，即使放一杯水在手臂上，也要水波不兴；发箭时，或连续发箭时，箭矢要重复在一条轨迹上。身体平稳，就像一个木偶一样。

人们十分熟悉的《列子·汤问》中记述的“纪昌学箭”的故事，则强调“先学不瞬，而后可言射矣。”

射技，要求练心、练眼、练力。这些练技的原则，至今仍广为杂技艺术家们遵循，而现代杂技中的弹、射、投、掷等技艺，更与古代的“射技”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

由上可知，古人的所谓“教民以猎”中的“教”，实质上也就是总结经验、提高技巧。人类在与自然的斗争中，调动了自身的潜力，创造了富于人类特征的走、跑、纵、跳、投掷、悬垂、攀援、较力、负重、飞越、平衡等一系列的技能。这些技能中的达到高超水平的动作——技巧，正是使后世的杂技艺术得以发生、发展的基础。

二、农牧与驯兽

距今大约八、九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开始出现原始的

农业。这一时代，或许就是相传的神农时期。我们祖先的生产活动，由狩猎向农牧转移。诚如古书所载：“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白虎通义·号》）；“神农之世……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庄子·盗跖》）。

可以说，这里的“与麋鹿共处”，实际上就是人类对于野生动物驯化的开始。在这一时期的大量遗址中，如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浙江余姚河姆渡，均发现有猪、狗、羊、鸡、水牛的骨骼。随着原始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猎物有了剩余，许多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也为人们所掌握，于是就出现了人工放牧。

远久的古代，驯养牲畜的人，就叫作“牧”。这个“牧”字，在甲骨文中是象形的羊和牛。这个牧字，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人对动物的驯养关系。而这种驯养，又为后来的驯化动物的表演，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就在这一时期，马也成为人类较早驯养的动物之一。在仰韶文化遗址中，人群居住的地方出现过马的骨骼。在以农牧为主兼及渔猎的原始社会生活中，驯服野马就更有其特别的意义。马既可以作为一种活的食品储备，又可以利用它的矫健，在原野上为放牧而驰逐。关于“驯马”最早的文字记载，见诸于《周易》，曰：“丧马勿逐自复。”其大意是，当你的马丢失时，不要去找，它自己会回来的。

由古人已熟识“驯马识途”的经验，可以想象我们的祖先自新石器时代驯马伊始，与桀骜不驯的野马间，展开了多少次的较量，终于掌握了驭马之术——最原始的马术。